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ZHONGGUO JINDAI TONGSHI

Guogong Hezuo yu Guomin Geming(1924-1927)

中国近代通史 第七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张海鹏 主编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

王奇生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ZHONGGUO JINDAI TONGSHI

Guogong Hezuo yu Guomin Geming(1924-1927)

中国近代通史 第七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张海鹏 主编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 - 1927）

王奇生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通史. 第七卷,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王奇生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6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5833-1

I. 中... II. 王... III. ① 中国—近代史③ 中国—现代史—1924~1927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 第 086240 号

中国近代通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张海鹏 主编

第七卷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

王奇生 著

策划编辑 吴 源 张 凉

责任编辑 彭晓路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18.875 插页 4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833-1

本卷定价 48.00 元

总 定 价 500.00 元(共十卷)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 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 强 李学勤 汪 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洪银兴 钱乘旦 郭齐勇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谭 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吴小平
成 员 刘健屏 黎 雪 张胜勇 王瑞书 吴星飞
顾华明 姜小青 黄小初 顾爱彬 刘 锋
余江涛 吴 迪 吴 源 胡明琇 章祖德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主 编 钱乘旦
项目总监 刘 卫
项目执行 王保顶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作者的话

《中国近代通史》十卷中，以本卷时间最短，前后不过三年多的时间。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历史风云变幻之急剧，为百年中国所罕见。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老革命党国民党与成立仅三年的新革命党共产党，携手合作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革命。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共同诉求。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革”发展成为“多党竞革”的局面。

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因为相互合作，两党力量都得到迅猛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又因为相互竞争，两党一直明争暗斗，直至最终武力相向。两党均“以俄为师”，其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具有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但两党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逐渐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者

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

孙中山生前确立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方略,在他 1925 年逝世后,很快付诸实践。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治”政权的建立。中国政治体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由“帝治”转为“军治”,又由“军治”转为“党治”。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的学习榜样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从鸦片战争之后的“师夷制夷”,到甲午战争之后的“取径东洋”,发展为这个时期的“以俄为师”。

若说五四运动孕育了中共,五卅运动则堪称是中共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共正式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开端。五卅运动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场城市市民运动。国民革命的蓬勃开展,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乃至北洋军阀的覆亡,五卅均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亦是一个重要契机。从五四到五卅,运动的中心由北而南转移;其后北伐战争又迅速由南向北推进。时空转换之迅速,亦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仅见。五卅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既是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口号的延伸,又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理念之升华。甲午以后,中国希望像日本一样跻身“列强”行列。那时的中国精英普遍信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中国衰弱是因为自己不争气。五卅运动使“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为全国民众普遍接受。而“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魅力,在于它将中国的一切贫穷落后都归咎于帝国主义,故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民族主义动员力。

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没有触动底层社会。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民革命,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目标下,工人、农民、青年

学生以及商人、妇女等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都被动员起来。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无疑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的最重要特征。国民党对民众运动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可以说国民党开始步入群众运动时代。但孙中山所倡导的“扶助农工”,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居高临下地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由于国民党人多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来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态,逐渐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一个注重枪杆,一个注重笔杆;一个擅长武斗,一个擅长文斗。当两党互相合作时,无疑是一对优势互补的搭档。当两党互相对抗时,共产党的笔杆毕竟敌不过国民党的枪杆。

国共两党协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一举战胜了北洋军阀,结束了袁世凯以后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但两大政党亦以此为契机分道扬镳,并从此开始一场更为持久的军事内战和政治较量。从革命的结局看,中共无疑是失败者,国民党无疑是胜利者,但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又走上了一条其革命对象所走过的老路,从而给共产党留下了新的革命发展空间。

1924—1927年间,南北军政格局均发生了快速激烈的变化。南北政权实际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南方革命力量在国共两党主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不仅没有止息,反而日趋激烈。实力较强的军阀觊觎中央政权,时怀“问鼎”北京之志;实力较弱的军阀则以“自治”相标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建构一个独立王国。他们之中谁也不足以慑服群雄,一阀独大。自吴佩孚因北京政变受挫后,北洋体系内不复有任何军阀再有武力统一全国的实力和雄心。任何军阀都无法长久控制中央政府。最终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台”的

局面。但他们在名义上仍都奉中华民国之“正朔”，未有某派军阀公然将自己的防区宣布独立于国家主权之外故，这个时期国家虽然分崩离析，却始终存在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权。中华民国的国号与法统得以维持不辍。

目 录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的形成 1

第一节 改组前的国民党 2

第二节 苏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早期接触 7

第三节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1

第四节 国共关系的初期形态 44

第二章 广州国民政府与南方军政格局 57

第一节 黄埔军校与党军的创始 58

第二节 大元帅府与革命基地的莫立 65

第三节 国民政府成立及其初步建制 73

第四节 国民政府初期的财政和军事 79

第五节 两广统一与革命基地的巩固 85

第三章 北京临时执政政府与北方军政格局 88

第一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90

第二节 临时执政政府成立 98

第三节	善后会议	104
第四节	国会的衰亡	114
第五节	国民军的崛起	119
第六节	军阀之间的循环混战	127
第四章	五卅运动与反帝高潮	139
第一节	反帝废约与国民会议运动	140
第二节	从惨案到运动	155
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对策	170
第四节	五卅运动的影响	178
第五节	省港大罢工	183
第五章	国共纷争：南方革命阵营的分化	189
第一节	弹劾共产党案	190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203
第三节	戴季陶主义	210
第四节	西山会议派	219
第五节	国民党二大与沪粤分裂	229
第六节	中山舰事件	236
第七节	整理党务案	245
第六章	北伐战争：北方形势与南方的胜利	260
第一节	北伐前夕的北方形势	263
第二节	国共对出师北伐的歧见	268
第三节	从广州到武汉	274
第四节	从南昌到沪宁	284
第五节	南北地域观念与宣传战	293

第七章 从迁都之争到宁汉分裂	311
第一节 迎汪复职运动	311
第二节 左派问题论争	323
第三节 迁都之争	330
第四节 南昌与武汉的对峙	337
第五节 “四一二”反共清党	343
第八章 南北三政权的鼎立	356
第一节 北京政府	357
第二节 武汉政府	368
第三节 南京政府	408
第九章 国共两党的组织形态	432
第一节 国共两党的党员构成	433
第二节 从“容共”到“容国”	449
第十章 急风骤雨：工农运动	472
第一节 工人运动	476
第二节 农民运动	503
第十一章 三大政党的“革命”观念及其政治文化	531
第一节 从“一党独革”到“多党竞革”	533
第二节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546
第三节 “革命”与“反革命”	552
主要参考文献	566
人名索引	578

第一章 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两者均是中国人“以俄为师”的结果。从“师夷制夷”,到“取径东洋”,再到“以俄为师”,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榜样的又一次大转变。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宣布改组。所谓改组,主要是对外联俄容共,对内进行党务革新。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发动和主导了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这是中国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场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国民党由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在野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崭露头角,由一个少数知识精英聚集的小团体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两党的宣传组织下,上千万工农群众被卷入到这场革命中。这在中国历史上亦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大革命实际只持续了两三年,而且其结局颇具吊诡意味:国共两党协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一举战胜了北洋军阀,结束了袁世凯以后军阀

混战和割据的局面。但两大政党亦以此为契机分道扬镳,并从此开始一场更为持久的军事内战和政治较量。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又走上了一条其革命对象所走过的老路,从而给共产党留下了新的革命发展空间。

第一节 改组前的国民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一个两极化趋向:一方面是军阀割据混战,社会祸乱相寻,政治极度失序;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异彩纷呈,新思潮汹涌澎湃,新生力量茁壮成长。正是这样一种看似歧异的矛盾格局,蕴育和催生了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

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国民党乃延续兴中会(1894—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和中华革命党(1914—1919)而来。自同盟会开始,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胡汉民曾对同盟会时期的“疏阔简易”情形有如下一番感慨:“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曾令闻者兴起,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①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国民党,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大批党员腐化变质,官僚政客群相涌入,党的革命性和组织性荡然无存,内聚力迅速消失。胡汉民描述当时的情形是:“长衫同志变成政客,武装同志变成军阀,同时军阀加入本党做武装同志,政客也加入本党做一般同志。”^②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很快被袁世凯分化瓦解。

孙中山每遇重大挫折时,常以“改组”、“改造”党为革新之契机。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其主旨虽在讨袁,但是建立一个

① 胡汉民:《自传》,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

② 胡汉民:《从国民党党史上所得的教训》,见《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3册,1236页,上海,民智书局,1932。

有强固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党,恢复民国前的革命精神,重订革命方略,开创革命新机,亦是孙中山的重要考量。但孙中山在组党方式上试图树立强人威权领导,并以封建会党的某些方式,如立誓约、按指模、讲服从、分等级等来严密约束党员,将革命党引导到一条秘密、狭隘和排他性的组织道路,引起许多党人的疑虑和抵制。一批重要党人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的实际运作效果亦距其理想甚远,其严格的组织形式妨碍了党势的扩张。加之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基地主要在海外,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相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反日运动中,革命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在护国之役前后,中华革命党并未能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①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移回上海。与此同时,孙中山为顾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逐步扬弃了中华革命党初期若干严格的党律,而采取较为宽松温和的组党路线,党组织又复松弛涣散。

1917年后,孙中山在广东进行护法运动,以武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论者一般认为这是革命党继辛亥之后为了维护民主共和所作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奋斗。实际上,此时孙中山护法所依靠的是桂系与滇系军阀,党组织并没有发挥什么力量。当时一般人亦只知道有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革命党”本身鲜为时人所提及,^②表明此时革命党所显示的只有党魁个人之魅力,而少见党组织之群力。

由于“党力”不彰,与孙中山结合的西南地方军阀又并非真心拥戴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因为缺乏实力而被时人认为无土地、无人民的“空头政府”和“超然政府”。当滇桂军阀不能容忍护法政府时,缺乏凭借的孙中山便不得不怆然离去,护法斗争宣告失败。经此失败,孙中山痛感南北

①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② 吕芳上:《寻求新的革命策略——国民党广州时期的发展(1917—1927)》,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308页,台北,1993。

军阀如一丘之貉,自叹“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由于对时局绝望,孙中山一度卜居上海,“暂不过问”实际政治,而潜心研究革命理论,继《民权初步》之后,又著《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三书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孙中山深感统一革命党思想理论之困难,提出“知难行易”学说。

孙中山探研革命理论之时,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孙中山自然不可能置身度外。翻检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有关批示、函电和演讲文稿,可知他对五四学生运动有过热烈的赞助,对新文化运动亦有敏锐的观察。爱国运动中,学生、工人、商人、妇女等民众纷纷组织起来,发挥了巨大的政治能量,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自叹不如。尽管一些革命党人积极参与和赞助了五四运动,但中华革命党并没有以一个政党的姿态,对这场运动发挥领导和引导作用。1923年7月《前锋》杂志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①

1919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与各省、各都会的学生会联成一个严密的组织。这是当时任何团体、政党所不曾有过的。国民党虽是一个有相当历史的政党,但其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联络指挥,尚不如这个全国性学生组织的完备和运作灵活。此事对孙中山刺激甚大。如何健全党的机器,如何使党与民众结合起来,成为孙中山亟须应对的一个问题。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希望吸纳广大青年学生加入其革命阵

^① 孙铎:《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523—52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